

中共高级干部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韦林 主编◎

自述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中共高级干部自述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诞辰 90 周年，我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辑此书。由于联系方式不详，责编虽费尽周折，但截至发稿，仍未与部分文章的著作权人取得联系。为了保证此书的顺利出版并尊重作者的著作权，我社特此声明，敬请未取得联系的作者来电来函，以便付酬。

联系人：楚双志 电话：010—62805906 E-mail: shuangzhichu@sina.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高级干部自述/韦林主编. —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35-4408-8

I. 中… II. 韦… III. ①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
事迹-中国②高级干部-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5670 号

中共高级干部自述

责任编辑 曲 炜 楚双志

版式设计 蔚红民

责任校对 王 巍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前 言

当我们歌颂英雄，赞叹那些开国元勋的惊人业绩时，我们常常是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我们也会常常涌起一种冲动要去探究他们的人生起点。他们有如此弘大的理想，如此不屈的求索毅力，如此撼人的牺牲精神，如此令人敬佩的伟业，是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其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分不开的。

本书是一部回忆集，通过收录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 37 位党政军高级干部对自己家世、少年及青年时代生活经历的回忆，向世人展现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求索中奋进的心路历程。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历经不同的磨难，但最终都确定了同一个信仰——共产主义，选择了同一条道路——为穷苦百姓的翻身解放而奋斗。

唐代诗人李贺诗歌云：“少年心事当拿云。”李大钊也曾经说过：“青年者，人生之王。”“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敏锐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他们就是这样一批豪杰，因其远大的理想和志向，从平凡的家庭中走向了不平凡的人生之路，创造了自己丰富多彩的立体人生，缔造了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的人民共和国。

远大理想和志向，更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品质。只有志存高远，持之以恒地追求，才能认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振兴中华的实践中书写出华丽乐章！



<u>伍修权</u> ：这一天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64
<u>朱 德</u> ：生产知识和革命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77
<u>何长工</u> ：从湖南到北京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81
<u>宋任穷</u> ：我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87
<u>杨成武</u> ：他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92
<u>杨得志</u> ：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中国人的力量	96
<u>陈再道</u> ：做主宰自己命运的革命人	110
<u>肖劲光</u> ：我逐渐知道了中国和世界	126
<u>余秋里</u> ：我深深感受到人世间的的不平等	134
<u>李德生</u> ：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137
<u>林伯渠</u> ：我一生的职业就是革命	145
<u>周恩来</u> ：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	151
<u>徐向前</u>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社会职业	154
<u>徐海东</u> ：我有一种革命的要求	162
<u>聂荣臻</u> ：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堂政治课	165
<u>秦基伟</u> ：我决心丢掉这个家走革命路去	172
<u>耿 飏</u> ：我带着寻找“宝山”的童话般的幻想离开了家乡	179
<u>萧 克</u> ：我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激动人心的学说	188
<u>黄克诚</u> ：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198
<u>康克清</u> ：当女兵成为我不可动摇的决心	209
<u>程子华</u> ：开始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	217
<u>粟 裕</u> ：我离家出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	221
<u>彭德怀</u> ：幼年的遭遇鞭策我不要腐化	229
<u>廖汉生</u> ：我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	233
<u>蔡 畅</u> ：我很钦佩毛泽东和我哥哥	239

<u>谭 政：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开始不满</u>	242
<u>谭启龙：这一天成了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中的第一个</u>	251
<u>赛福鼎·艾则孜：我始终怀有一种神圣而念念不忘的感情</u>	258
<u>薄一波：这是一个有着一部奋斗史和辛酸史的家</u>	272

※本书目录按姓氏笔画排序

※篇名编者后加

邓子恢^①：

这是我以后向往革命的社会基础

我是福建省龙岩县东肖人民公社邓厝大队人，生于1896年。我父亲是个穷秀才，靠行医（中医）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我长大时家庭十分贫苦，我母亲除服家务外，还长年上山砍柴、下田种地，我兄弟、姐妹四人从10岁起也天天跟着母亲劳动，因家庭贫苦，我从16岁小学毕业后不能上中学，在家从事农业劳动，18岁我父亲才勉强筹备经费送我上中学，读了4年书。我父亲虽是个绅士，在农村中有些声望，但因家庭贫苦，往往受富豪绅士的欺压打击。我13岁那年，母亲死葬在张家坟前，照旧例不犯规，但当时张家是东肖大族，又是最大的富绅巨贾，在他们幕后指使下，发动一些爪牙把我母亲的坟墓平毁了。由于当时县衙门都是富豪掌握，我父亲无法与之诉讼，只好忍气吞声，让他平毁。1918年又因张家富豪占用公家庙宇办学，引起东肖广大农民义愤，前往示威，我父亲又被张家富豪诬告为煽动农民破坏教育，由县衙门下令缉捕，我父亲乃星夜逃跑外出，一直到1921年死在广东之南雄。这几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使我认识到旧社会阶级压迫的实质，这也是以后我向往革命的社会基础。

我18岁入中学，后龙岩县政府招考公费留日学生，我考上。于1917年到日本东京留学一年多，因公费不够开支，家庭又无力补助，于1918年辍学回国。当年便到江西崇义县杰坝圩我堂兄经理的庆昌和商店，当了9年店员。1926年冬我堂兄病死，我暂时代理，但

^① 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代第一书记，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



1927年夏我因参加革命运动在崇义和龙岩两地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商店被没收，我潜回龙岩。从此以后，我便一直从事革命工作，未曾间断过。因此，我的家庭成分，我父亲在世时是自由职业者，我父亲死后，我当家时是店员，在我被通缉以后长期以革命为职业。在闽西土改以后，我家分到了土地，便成为自耕自食的中农。

青年时期我的思想变化：1915年我在龙岩省立第九中学读书时期曾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及抵制日货运动。后又发动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的学潮，当时只有空洞的爱国思想。在留日期间，目睹日人对华人的轻视态度，更增加爱国情绪。当时常看康、梁文章，颇受影响。五四运动后看了《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1920年看了无政府书籍，又向往无政府主义。不久看了《共产党宣言》，乃信仰共产主义。1922年看了《向导报》，知道中国有共产党组织，曾写信给陈独秀，要求入党，未获答复。这年上半年我从江西回家，在本区任小学教员，曾联合本县进步青年组织“奇山书社”，目的在于团结新青年，传播新思想，当时参加书社的有200多人，成为后来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共产党的骨干。1923年我又回家，就在“奇山书社”的基础之上出版《岩声报》，此报主要是暴露当时军阀官僚与土豪劣绅贪污舞弊，压迫人民的黑幕，并从中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岩声报》在厦门出版，在龙岩、南洋、漳厦、潮汕、广州、赣州、南雄及有岩侨所在地区销行。开办头几期就集中力量揭露当时军阀赖世煌勾结龙岩劣绅杜连茹等强迫农民种鸦片的黑幕，深受岩侨欢迎，影响颇大。1925年我又回家，当时厦门有国民党组织，由友人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并在龙岩发展了几十个党员，成立县党部。是年秋我回到崇义，又在当地发展了国民党员。1926年秋，北伐军占领赣州，崇义解放，在杰坝圩成立区党部，我任常务委员，这就是我在入党之前的思想变化过程和参加社会活动情况。

总结此时期我的思想是由爱国主义进步到信仰共产主义，这主要是受五四运动及革命书报的影响，但由于我家庭的贫苦及所受旧社会种种压迫也有极大关系。

1926年12月我在江西崇义县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候补期，介绍人是陈赞雍（崇义人），他是崇义县支部书记。

1926年冬入党后即任江西崇义县杰坝圩从事农民运动，一方面利

用国民党的公开招牌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对农民进行个别谈话。当时崇义县长蔡舒很坏，党支部决定在1927年五一节发动群众进城示威，口号是：“反对苛捐杂税”，但此消息被蔡舒知道，蔡即下令戒严，我们仍号召农民照原计划进城。当时支部指定我为宣传鼓动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与陈赞雍同志领导示威游行的群众冲进县衙门，把蔡舒逮捕起来，之后即成立崇义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我任委员，并以所缴县警80支步枪组织起工人纠察队。不久广东清党军进入赣南，蔡舒即勾结湘赣边著匪胡凤章攻城破监，大搞白色恐怖，我工作的那家商店被没收，我被通缉，我的堂侄邓秋源被捕坐监，以后牺牲，我因事先化装逃走，得免于难。当时在龙岩也通缉我，因此我回到瑞金，在同乡店里住了一个月，于7月间才回到龙岩，经过旧同学接上了党的关系。我一回到家里，村里农民都来看我，但他们不是诉土豪劣绅迫害之苦，而是诉说对当时国民党党部的不满。因为1927年2月间，以我们党为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进行烧神运动，把我们邓家所供奉的铁山庙阎罗天子烧掉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反感。4月间龙岩清党时，反动派即借此机会煽动农民打县党部，当岩平宁监察署专员张旭高同志（共产党员）出走时，我们家里农民还赶到山上去抓他。我回来后他们便大骂张旭高，说这批人没有帮我们做什么好事，却把阎罗天子烧掉了，这对我们邓家很不利。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先批评张旭高一顿，说这批青年人幼稚，做事不踏实，为什么烧阎罗天子呢？阎罗天子对我们农民没有什么害处，害我们农民的不是坐着的阎罗天子，而是站着的阎罗天子，是杜连茹那些土豪劣绅，他们每年替军阀派捐派款，派兵担，收重租，放高利贷，榨了我们多少钱，害我们吃了多少苦头，这些站着的阎罗天子才是我们农民的死对头。我们一年辛辛苦苦，但赚来的钱都给这些人敲去了，因此农民一辈子穷，再拜菩萨也翻不了身，只有革命，把土豪劣绅打倒才能翻身。说到这里，群众情绪立即转变。我抓住这个机会即问大家今年收成如何，大家说，不很好。我即提议减租：“硬租减一成，软租减二成”，大家都赞成，但是说收租人不肯没有用。我提议组织农民协会，大家一条心，大家一致这样做，肯减的就减，不肯减的就欠，决心不交足租。这个时候群众便高兴起来，因为此时正是割早稻的时候，减租正是农民当前最迫切而且也是最实际的利益所在。从此邓厝就开始减租，以后这个消息传到各乡，各乡群众都来找我，请我到他们乡里去





演说。我的演说内容主要是说明农民贫苦是由于受剥削，不是什么命不好，运气坏，农民要过好日子，只有组织起来实行减租减息，打倒豪绅地主，这对当时农民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当时由于农民运动的发展及军队调防，龙岩白色恐怖稍趋缓和，但龙岩还有一批共产党员被关在监狱里。那时上杭国民党已经恢复，县党部掌握在我党手中，因此经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指示，龙岩支部要我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上杭，向上杭驻军蓝玉田请愿（龙岩军队是上杭派来的），要求解放被捕同志。此次请愿成功了，被捕6人一齐获释，这样即结束了龙岩白色恐怖的局面。当时福建清党后的国民党省党部有龙岩人（詹调元）在内，委派“左派”分子苏庆云（九中同学）到龙岩重组县党部，其中宣传委员谢宝萱、组织委员郭滴人均均为共产党员。为了便于公开活动，我任县党部秘书，与郭滴人同志共同负责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当时龙岩正处在新旧军调防交接时期：陈国辉匪军新来，与当地豪绅关系尚未融洽，情况未摸清；龙岩豪绅新派老派之间又有矛盾；而四月清党之后的白色恐怖刚被冲破，农民运动正在恢复。因此，当时龙岩党的方针，主要是乘此机会利用国民党县党部这个合法机关，公开开展农民运动，以实现“二五减租”，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从1926年龙岩解放以后虽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宣传“二五减租”，但农民并未得到实际利益），以加强党在农民中的影响，建立党在农村中的阵地。为了便于公开活动，避免过早引起驻军干涉，我们未公开提出反对陈国辉和“反捐税”的口号，而只提出“合理负担”的口号，即反对捐款按户口分摊，改为按田亩摊派，有些地方则由祖宗公产摊派。这个口号不仅得到农民的拥护，而且也得到中小地主和商人的赞助。对土豪劣绅，我们也采取分化办法，只提出反对杜连茹（老派首领），而不公开反对邓丰稔（新派首领）。在农会组织上则采取“个别发展，扎根串连”办法，并实行双重组织形式，一般农会都有秘密和公开两套组织，先由积极分子组织秘密农会作为基础，以后再由秘密农会发展成为公开农会。在发展步骤上，先在一个乡打下基础，而后再由这个乡向四周发展，这就叫做“波浪式发展”；与此同时又派人到别区去做好一个乡，让它逐步发展，这就叫做“跳跃式发展”。这样乡与乡、区与区之间的群众运动就逐渐联成一片，这就叫做“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当时凡是这样做的地方，农会就比较巩固，农会领导人也比较纯洁，减租和合理负担也比较易

于实现。由于当时党的方针和做法对头，所以工作进展很迅速，从六七月秘密农会恢复起到 11 月中旬，在全县 2/3 以上地区都组织了农民协会，有农会组织的地方都实现了“二五减租”和“合理负担”，农民第一次得到了实际利益，对我们干部信仰很高，打下了党在农民中的组织基础。现在看来，当时龙岩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作是踏实的，策略是灵活的，因而成绩也是很大的，这对以后龙岩革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人物》1981 年第 6 期

• 5 •

邓子恢：
这是我以后向往革命的社会基础





邓颖超^①：

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 6 •

1903年，我出生在中国西南部广西省南宁市，我家只有一个孩子。我父亲是一位军官，也是一位政府官员，我还不到6岁他就去世了，留下我母亲，没有什么家产。由于我们家没有近亲照料我们，我母亲不得不找点事做。她是一位受过教育、有才智的妇女，但要找点事做对她来讲是很困难的。我们迁到了天津，她在很艰难的条件下当上了教师，勉强维持生活。对我来说要得到好的教育是不可能的。但在1913年，我进了一个学校，这所学校叫平民学校，我母亲在这所学校里任教。我得到了开办这所学校的社会党的帮助。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甚至那时我就在这所学校里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当时，袁世凯是政府首脑，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他。后来，他关闭了这所学校，逮捕了大部分教师，杀害了校长。这些社会党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受到了一些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我母亲同其他教师失业了，我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她懂一点医药，当了护士，并且当了家庭教师。她那时送我上了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我积极地参加了学生运动，反对政府接受“二十一条”。

这时我已经长大了，能够认真考虑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了。每当我漫步街头时，我常常看到当新娘和举行婚礼的，但我下了决心：如果

^① 邓颖超（1904—1992），女，河南光山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位妇女要想过独立的生活，她必须能够保证有一个好的工作。

进师范学校初级班时我 13 岁，经过两年极其刻苦的学习之后，我学完了这所学校规定的 8 年的全部课程。因为我年纪很小，学习太紧张，我的身体垮了下来，染上了肺结核病。然而，我母亲知道怎样照料我，我又恢复了健康。

在这段时间里，我憎恨中国的旧习惯，比如包办婚姻和对妇女的不公平待遇，但我提不出纠正这种做法的建设性主张。我只是想，如果一个女孩要想过独立生活和获得自由，那她就必须自食其力。在学校里，我最感兴趣的课程是地理、历史、音乐、体育和汉语。我不喜欢缝纫。

我在 1919 年反对亲日派的五四运动中非常活跃，并领导学生同一些反动教师进行斗争。天津的学生 5 月 7 日行动起来了。我们把男学生和女学生分头组织起来，因为要让男女学生一起行动是更困难的事。我们的组织是妇女爱国联合会，我们同男学生合作，其中就有周恩来。在这群情激奋的时刻坐下来学习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我们把一位日本老师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材——现在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为了同日本人进行斗争，我们必须学习日语。当局把我们一些学生拘留起来，我们彼此无法联系。我们受到教师的镇压，得不到外界的支持。回顾这段时期的往事，我们当时能够继续进行斗争，现在看来是很了不起的事。然而，为了把五四运动坚持下去，10 月 10 日，我们不仅把学生组织起来，而且把天津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了。我们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集会，天津警察把好几万人的集会围困了一天一夜。我们讨论了对策，决定让女学生当先锋冲破封锁线，因为我们想，警察不敢轻易动手打我们。我们用竹竿当旗杆，以便用作棍棒。当我们正要离开时，派去散发传单的汽车回来了。周恩来坐在车里面，于是利用这辆汽车帮助我们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我们对警察十分愤慨，要求他们道歉。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爱国。警察派代表同我们磋商，但我们回到学校心里仍十分气愤。第二天，我们又上街同警察斗争。在那几天里，所有的火车和交通工具都中断了。

1920 年 5 月 7 日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学生们想举行一次集会，纪念国耻日，但校长进行阻挠，并且扬言谁参加集会就开除谁。不管怎样，学校的全体学生还是都去参加了集会。当我们返回学校时，所





有的门都给锁上了，我们不能进去。墙上贴出了上面写着将要开除的所有学生领导人的名单。我们讨论怎么办，所有学生都聚到一块，决定离开学校。那些家不在天津的学生住在同学家里。这时当局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控制学生，设法说服他们返回学校。我们不得不走出城外10里去找个地方开会。我们动员了所有同情我们的家长、报纸和其他组织支持我们，经过就这个问题进行一周的斗争之后，成功地使学校当局撤消了开除学生的命令。

这年夏季，我从师范学校毕业，结束了学生生活。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段时期里，男女学生都分别地组织了起来。后来在天津思想进步的学生中，开始组织了一个大约有20名领导人参加的组织，名叫觉悟社。我们在这个组织里谈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我们讨论俄国革命，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却一无所知，当时陈独秀刚刚开始组建共产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学生有郭隆真和马骏。今天这个组织里唯一活着的人可能就是我和周恩来了。这个时期为后来的活动打下了基础，对新思想虽然认识混乱，但至少教育我们要憎恨中国的旧制度，以及为改变这种制度要进行斗争。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

现在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之后，学校开始使用女教师。我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找到了工作，这所学校附属于师范大学。另一个女孩子和我是在这所学校里首次任教的女教师。我们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继续提高我们自己的教育水平。我们的许多同学都到国外留学去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母亲失业了，我必须养活她。第二是结婚问题。一方面我憎恨旧式的婚姻，另一方面我也不同意所谓的自由恋爱思想。这时，男女学生们对这种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要建立一种现代的婚姻是很困难的。许多悲剧发生了，男人常常不负责地同女人离婚。我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个。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当时周恩来和我只是好朋友。我只有17岁。我在学校工作是很艰苦的，我早上7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我是这所学校的主要教师，我的任务很重。当时正为女孩子开放更多的就业机会，她们甚至在银行里也能找到工作。事实上，北京开设了一家妇女储蓄银行。突然出现了许多讲授会计和商业工作课程的学校。我想，也许我到银行里工作能挣更多的钱，也就能积蓄一点钱供自己上学，所以我夜间还到一所会计学校学习。然而，

两个月后，由于这种学习加工作的紧张生活，我的身体垮了。我放弃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从一所商业学校毕了业，但未能在银行里找到工作。在北京呆了两年半之后，我回到了天津，在一所小学当教师。

这时我的朋友全都受到了更进步的思想的影响。1923年，我遇到了一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蔡和森，不久我就结识了好几个共产党朋友。在北京，女权运动——女权运动同盟——已经开始活动，我们在天津也同样开始了这样的活动，为争取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平等而斗争。上海、广州和其他地方都有这种运动。在1924年以前，我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1924年天津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加入了。我们成立了宣传部，我是领导人之一。入团3个月之后，我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妇女书记。这时，我们正在建立国共两党联合阵线，所以我也参加了国民党。孙逸仙从广州来到华北，呼吁召开国民议会，讨论全国问题。许多组织开始声援召开这个会议。为了得到如何召开这次会议的建议，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代表参加的会议。正在开会期间，孙逸仙去世了，这对我们产生了强烈影响。我是天津的代表。这时，我的一位朋友和我正出版《妇女每日新闻》，但这项事业后来失败了。

孙逸仙去世一个半月之后，上海爆发了五卅劳工运动。我们在天津积极地作出了响应。我们在天津有两个组织：一个组织的宗旨是“救国”。我是地方分部主席之一，一直很活跃。天津警方很注意我，并搜查了我的文件。当国民党为其第二次代表大会挑选代表时，我被选为直隶地区党代表之一。在去广州的途中，我在上海停留了10天，我在那里会见了几位女共产党员——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和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我访问工厂，发表演讲。当局没有进行干预。

我1925年8月到达广州后，周恩来和我结婚。我担任广州共产党妇女部的书记，而且一直担任到1926年1月。作为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当廖仲恺夫人的秘书，同她以及孙逸仙夫人合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我在广州一直工作到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6月我逃到了汉口，在那里待了5个月。生活非常困难。我做秘密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1927年年底，我去了上海，在那里建立了党中央委员会。我负责妇女部。1928年5月，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1月返回中国。回国后我一直待在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妇女部

邓颖超：
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工作，直到 1932 年上海战争爆发之后。这是小心谨慎的秘密工作。我每天出去，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捕。警方搜查了我在外国租界的房子。第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共产党人，我帮助他们工作。后来他们当中有些人和许多其他共产党人一起被捕。这时，许多好朋友都被杀害了。我们的工作在上海已不可能进行了，于是我于 1932 年到了江西苏区。从事这种秘密工作以及共产党人受到的镇压使我更加忠于党，自那时起，我就坚信失败是绝对不可能的。

本文节选自海伦·斯诺《中国新女性》

毛泽东^①：

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 1893 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 15 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 60 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 35 担——即每人 7 担左右——有 25 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 7 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 84 担谷。

我 10 岁时家中有 15 亩地，一家五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 7 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 49 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动。我 6 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

①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